

文化田野的报告

高有鹏 主编

Field Research of
Folk-Custom

技艺 记忆

孟芳 著



——朱仙镇年画的文化考察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田野的报告

Field Research of
Folk-Custom

高有鹏 主编

技艺·记忆

朱仙镇年画的文化考察

孟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艺·记忆：朱仙镇年画的文化观察 / 孟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5426-5615-5

I. ①技… II. ①孟… III. ①版画—年画—研究—开封市 IV. ①J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5485号

技艺·记忆：朱仙镇年画的文化观察

著 者 / 孟 芳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周青丰 李志卿

装帧设计 / 乔 东 阿 龙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李志卿 郭利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5.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15-5 / J·236

定 价 / 4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目录

绪 论 / 1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3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7
- 第三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20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22
- 第五节 田野历程 / 24

第一章 朱仙镇年画历史的口头叙事 / 30

- 第一节 朱仙镇木版年画与我国其他地域年画之关联 / 30
- 第二节 关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名称之争 / 35
- 第三节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上的画店分布 / 40
- 第四节 朱仙镇木版年画艺人到底有多少 / 53

第二章 年画制作技艺的口头叙事 / 65

- 第一节 手工艺的语言——画诀的叙事意义 / 66
- 第二节 年画制作的叙事——坚守与改变 / 72

第三章 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叙事 / 86

第一节 回归故事生活，以年节为中心的故事叙述

——年画故事的选取 / 86

第二节 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叙述中的历史记忆 / 98

第三节 开封话讲述的“开封味儿”

——开封方言的叙事研究价值 / 105

第四节 为什么会产生这类年画 / 127

第五节 戏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材来源 / 131

第六节 叙事的形式、视角及视角的变异

——故事讲述者的叙事 / 134

本章小结 / 156

结 语 / 159

绪 论

河南省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当地民众地方文化的形象展示,蕴含着当地民众心中的多重祈求,具有“百科全书”的意义。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叙事,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活态的民间叙事,通过文本的叙事和语境的叙事,在具体生活过程中完成它的叙事功能,其中包括年画的制作、年画图案色彩线条配置的文化解读、年画的售卖与张贴、年画故事讲述的方式、讲述人与受众的互动、年画故事的呈现等诸多内容。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注意到其叙事是多重叙事,包括年画制作者的叙事、年画工艺的叙事、年画故事的叙事以及贴年画的叙事,还有年画欣赏者口口相传的叙事。^[1]年画的传承及其被认同,事实上是与我国古代“立像以言义”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无论我们怎样研究叙事,总是要以“事”的“叙说”为条件,“叙说”的方式多种多样,都是为了“事”。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画”正是“事”的基本载体,对于“画”的“叙说”,即口头流传的朱仙镇年画发展历史的语言叙事、在朱仙镇民间艺人年画制作过程中以技艺传

[1] 刘铁梁先生语。刘先生多次对笔者提出论文写作时应该不断思索改变视角问题。万建中先生强调既要走进年画,又要走出年画,看到年画里里外外相互联系的内容。

承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叙事、在地方民众生活中表现朱仙镇年画民间故事特定内容的功能叙事就成为我们探讨年画叙事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三个非常简单又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年画是哪里的或为什么是在那里出现，这里的年画是怎样制作的或由谁制作的，年画制作完成之后干什么用或者怎样用。

诚然，“立像以言义”，年画故事的叙事在年画叙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年画故事不但借助年画载体（媒介），而且借助年画创作者的创作和欣赏者的心领神会发挥其叙事功能。年画的叙事首先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形成自己的“场”，需要民众“捧场”，民众接受、认同年画，年画才有市场，年画因为民间艺人得到市场才得以生存、传承。“捧场”作为认同，首先是对“画”的认同，在“这一带”形成不可轻易地被替代的品牌。一定地域的民众为什么自愿接受这些内容？“捧场”的理由是什么？民众的叙事与年画的叙事如何结合在一起？或者说，这里的“话语权”如何建构？由谁来统领？

叙事的地方性不仅仅指民间故事，还包括整个（各种）叙事概念。朱仙镇木版年画叙事是讲述人将当地民众耳熟能详的地方性传统文化知识通过年画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具体的文化活动中进行讲述和表演的。当地民众，尤其是民间专业年画制作者从自身出发，通过年画创作活动将对生活的理解和需要，从各自的感情与视角传承传统木版年画，并创作出自己的“这一个”来，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即自然打上了深深的地方乡土文化色彩的烙印。尤其是在它特定的语境（包括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语境和每一次的年画制作活动

语境)中,它通过具体的民间叙事的生成、传播、传承、再生产,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它是一个“集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1]各种叙事元素的配合和相互借用,包括年画制作过程的叙事、年画故事的叙事、画里画外的叙事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示历时性叙事的同时也打开了共时性空间下活态的民俗生活画卷。朱仙镇木版年画以年画故事为中心的各种叙事活动互相牵制和配合,互为文化重构的“词典”。

年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本文只是选取年画叙事为视点。叙事只是年画故事研究的一个方面,其中,在叙事即年画“事”的“叙说”背后,包含着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谁在叙说,在哪里叙说,在何时叙说,叙说的是什么,如何叙说,为什么要这样叙说,为什么叙说的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样叙说与别样叙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这样叙说之后又会发生什么结果或效果,等等。

第一节 关于选题

“叙事学”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于1969年明确提出,热奈特等学者使之更加系统化。最初的叙事学研究主要在文学领域,它经历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叙事结构等研究阶段(以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格雷马斯为代表)。也有学者把这一概念与俄罗斯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联系起来。作为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它又是在众多的语言学家、文艺

[1] 杨利慧老师语。杨利慧老师对笔者提出注意集体性传统与民间艺术的个人创造问题,启发了笔者对叙事传承等问题的思索。

理论家、民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众多学科和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建构和发展起来的。众多学者从自身的学术储备出发为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们结合叙事载体以及使载体发生叙事功能的诸多范畴——如时间的、空间的、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因素——来解决叙事研究的问题。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其实就是通过叙事研究故事，可以更深入细致地看到民间故事以传统木版年画的形态存在与传承、变化、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形态密切联系的普遍性意义与规律。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名称和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生产合作化时期由著名美术家刘岷提出的。刘岷曾经活跃在30年代上海的版画界，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其时任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艺术系教授。他与同事马基光等一批美术家走街串巷，搜集、整理、挖掘出一批传统木版年画。朱仙镇和开封都有传统木版年画，而且两地来往密切，因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明清时期就有较大的规模，晚清时期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等人曾经来这里考察，使之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加上鲁迅先生曾收集了许多朱仙镇木版年画，刘岷等人便决定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两地木版年画的统领性标志年画名称和概念。从此，这一名称流行开来。

朱仙镇是开封市行政区下属的一个镇。开封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上的七朝古都。这里的文化积淀相当深厚，厚厚的城墙挟裹着唐代大相国寺、宋代开宝寺铁塔、元代延庆观、明清时代的龙亭建筑群与山陕甘会馆等历史古迹。诸如斗鸡、斗狗、斗鸟与书法、戏曲、武术等文化遗产，仍然保存在地方

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封人和朱仙镇民众一样对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着特殊的情感：大街小巷，许多商店摆放着年画商品，店主不厌其烦地向人介绍年画，讲述年画中的故事。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与其他地方不同，开封朱仙镇人把朱仙镇木版年画俗称为“道酉”，贴年画俗称“贴道酉”“糊道酉”。

“道酉”是开封，包括朱仙镇年画生产地区对于木版年画的俗称，既称“道酉”，也称“年画”“年花儿”，或称“道酉年画”“年画道酉”。在其他地区，如旧时北京也有“道酉”，有“二十九，贴道酉”的习俗，但是，他们所说的“道酉”是指用线串起来的一片片黄纸钱；在客家人居住的福建晋江一代，保存了贴“道酉”二字即贴春联的中原旧俗。在河南的其他地区，如豫西地区把“道酉”写作“道有”，解释为“酉”即大有年的“有”。开封地方民众解释说，道即“数”“理”，俗称“年庚道儿”，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道”，包含着述说、表达、显示等意义，而“酉”则取之为天干地支中的“酉鸡”，即“酉”为“鸡”（开封方言读为“鳩”），“鸡”为“吉利”。更通俗地讲，“道”就是展示，“酉”就是吉利。木版年画，即通过一定的故事展示（叙事）达到趋利避邪的目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被模糊概括为“道酉”，包含着这一地区民众独特的审美方式与情感表达的内容。这里，笔者主要选取了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被概括为“道酉”及其相关习俗，形成年画故事叙事的地方性特征的内容具体展开研究。

换言之，年画即“道酉”，对于本课题的研究而言，故事

研究离不开木版年画。这里的故事是年画即“道酉”的故事，而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故事。

民间木版年画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融入民众生活，形成不同地区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的形象再现。其人文蕴含深厚，信息承载密集，民族心理表现鲜明与深切，是民间美术中的翘楚。就年画内容而言，立像以言义，每一个画面、每一种色彩、每一个符号都具有故事的具体内涵，不断的被讲述、被阐释，进入故事—画面—故事的循环过程。而故事的生成与转换，又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意义。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年画的重要典型，在我国民间艺术历史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一种极具特殊性的地方化的物质载体，用其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许多学者更认同于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本的真实性与全面性的一段论述，即“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环境的非生活的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娱乐传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同文本一样都必须加以研究。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成长的氛围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1]的确，“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

[1] [英]马林诺夫斯基语，转引自《世界民俗学》，[美]阿兰·邓迪斯著，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流传又确实与“道酉”这一特殊的“纸”密不可分。如果离开了年画的“画”，恐怕故事也就不存在了。“道酉”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俗称，其中的故事叙事是通过画面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的，讲述作为叙事的一种形式，表现出独特的“开封味儿”，“味儿”即年画故事叙事的特色。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

我们应该看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叙事研究首先是关于年画的研究，以年画为中心，其次才是叙事研究。

目前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者眼光主要停留在年画作为普通艺术文本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说是文本化的研究。其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般描述性居多，学理分析介绍性较多，总体把握偏于概括而少于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0年至1949年之间，这是起步阶段，如日本编印的《中国明清之版画》和《东洋版画》，法国学者达尼埃尔、埃利奥伯格等人编印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集》《民间新年神话像》《朱仙镇木版年画》和苏联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民间绘画》，奥地利人编印的《朱仙镇木版年画集》，德国出版的《中国年画》《中国木版年画集》等国外专集，都分别专题或大篇幅地介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以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美国学者盖

洛、法国学者杜伯秋、达尼埃尔、夏凡纳等和以鲁迅、郑振铎、李廉方为代表，他们以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主要方式。其中，李步青（字：廉方）编写的《岳飞与朱仙镇》、美国学者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1903年他在开封居住）中对于开封与朱仙镇年画的介绍有着特殊意义。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20世纪50年代曾经成立朱仙镇年画合作社），是重要的发展阶段。以刘岷、马基光、倪宝诚为代表，他们仍然以传统年画的搜集整理为主要任务，同时，他们一方面关注到传统年画与现代文明的结合问题，研究传统年画如何表现婚姻自由、抗美援朝、合作社等新生活内容，一方面在《河南日报》等报刊介绍传统年画的现代价值。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传统年画的保护与发展。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相对热烈的局面，是研究成熟阶段。以2002年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开封论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为典型。这里集中了冯骥才、王树村、薄松年、张道一等一批学者对于我国传统木版年画的研究，其中许多文章涉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如薄松年的《试论朱仙镇门神画中的戏曲形象》，他指出，“朱仙镇年画以门神和神码最多，样式丰富，品类齐全，艺术上也最有特色，一些研究论文亦多侧重于此。但在门神造型，特别是人物戏曲化的形象塑造问题上，似尚很少涉及”，“朱仙镇门神中还有一些戏曲题材，实际已演变为房门画，在其他地区亦较少见”。关于朱仙镇木版年画与戏曲的研究，确实是相当薄弱的的一个方面。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丛书《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

(中华书局, 2006)的“前言”, 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内容、历史传承、价值意义的全面介绍总结。此外, 河南大学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等出版社, 包括朱仙镇年画艺人出版印制的多种年画集, 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年画故事有着不同程度的介绍。

如前所述, 在研究方法上, 一般性介绍较多, 其研究多集中于艺术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方面。其中, 以艺术学研究占据多数。如李双林《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与现代艺术价值》(《美术大观》, 2007年2月)、姚敬旭《从浅析朱仙镇木版年画出发——简论民间木版年画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发展》(《美与时代》, 2007年10月)、周东海《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色彩表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4月)、胡国正《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装饰》, 2003年5月)、井晓雪《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平面设计意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3月)、李晓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发展述略》(《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04年2月)、郭晓霞《朱仙镇木版年画赏析》(《东方艺术》, 2005年4月)、袁汝波《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及程式化语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3月)、崔秀莲《审美朱仙镇木版年画》(《中州今古》, 2003, Z1)、王宇锋《朱仙镇木版年画与中国工笔人物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5月)等, 他们多采用现代艺术学理论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进行透视、解析, 力图发掘出其现代价值。黄燕的《朱仙镇、杨柳青、绵竹三地木版年画色彩特征比较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7)是这一主题研究的集大成, 她在地理分布

的研究层面上有许多突破。也有人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对此提出了一些见解，如2007年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与文化产业高层论坛，就有人提出一定要改变传统，实现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同时，有学者努力钩沉史料，希望梳理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脉络。如李万卿《气息奄奄的“文化瑰宝”——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及现状的调查》（《中州今古》，2001年2月）、袁汝波《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衰》（《史学月刊》，2003年6月）等。张体义《〈留住手艺〉之一——张廷旭：木版年画的坚守者》（《中州今古》，2003,Z1）、郭红彦《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统传承模式及其当代思考》（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等文章注意到了民间文化的传承问题，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郭红彦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统传承模式及其当代思考》，是在对民间艺人进行个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如她指出，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木版年画之鼻祖，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的重要载体。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朱仙镇年画艺人通过师徒传承和父子传承两种传统传承模式，不仅传承了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而且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人文思想和文化品格。其主要探讨师徒传承和父子传承两种传统传承模式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以及它们在现代产业经济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对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新的思考。她提出，朱仙镇木

版年画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要继承和发扬这一古老艺术，必须以传承为基点。她分析说，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和雕版印刷的发明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出明清时期，朱仙镇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繁荣的经济文化使朱仙镇木版年画进入了黄金时代。“文革”期间，朱仙镇木版年画遭受重创。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它又重新大放异彩。其主要论述的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统传承模式，细分为师徒传承、师承关系等，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与发展这种传承方式。

其他方面，相关的研究从不同程度涉及朱仙镇木版年画问题。如赵红瑶《论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东方样式》（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孙珍珍《浅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语言样式对中国油画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6）、宫昌华《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刘雁之《陕西凤翔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西安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6）、刘平《中国清代武戏年画与日本同期浮世绘武士绘之比较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刘婕《山东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个案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5年7月）、冯敏《中国木版年画的地域特色及其比较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5月）、房开柱《对木版年画的思考》（《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4月）、袁宙飞《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张北霞《湖南滩头木版年画图案与色彩艺术形式研究》（湖南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等，他们更多的都是从艺术学的视野出发研究

民间艺术。其他还有学者注意到朱仙镇木版年画是否应该属于开封年画的文化属性问题，如祝仲铨《忧思：开封年画》（《河南日报》，2005年12月30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又确实值得人深入思索的一个问题。

年画的标志性内容确实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艺术研究的层面，便容易忽略艺术是属于文化的基本道理。如何开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空间，其实也不仅仅是艺术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研究的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回归问题。叙事研究为这一问题打破许多缺口。

（二）民间叙事研究

年画的核心或者认同基础在画面的解释内容与解释方式，即叙事。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叙事内容与方式，这里分为语言叙事、生产叙事和功能叙事。一般意义上，其同属于生活叙事与文化叙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狭隘的故事述说。具体来讲，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叙事研究，我们还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著，所以这里只能就相关民间叙事的研究状况与本课题的联系展开学术史的回顾。

叙事学的研究，主要是民间叙事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更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民众生活的普遍性叙事结构与叙事原则，对于年画故事这一特殊故事形态则缺少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近年来，关于民间叙事的研究渐渐成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叙事活动首先离不开故事的讲述。书面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差别及其叙事特点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表现得非